

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杨大庆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围绕两国间历史的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事件(又称南京暴行)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热点。因此,中日两国间展开的历史对话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自然备受国内外各方的瞩目。

一 国际历史对话的重要性

首先,什么是国际历史对话?近年来,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者、教育工作者围绕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对话,其持续性和成果都超出以往以国际学术会议为手段的学术交流,国际历史对话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①

国际历史对话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有过多次战争的法国与德国,在1930年代就改善两国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为期数年的对话,不过,随着纳粹德国的对外战争的开始而告中断。二战结束后,两国重新恢复了围绕教科书的历史对话,一直延续至今。两国的部分历史学者和教师在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两国共通的历史教科书。德国(当时的西德)在上世纪70年代初,作为其改善与东欧各国关系的“东方政策”的一部分,开始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历史教科书对话。经过多次讨论,参加对话的两国学者对德国的教科书提出了26项改善意见。

欧洲冷战结束后,国际历史对话更加备受重视。一些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未受重视的历史问题,比如二战时期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成为历史对话的课题。同时,前南斯拉夫瓦解后的内战及其发生的战争暴行,也说明以自我中心的历史蕴藏着新冲突的危险。由西方历史学者牵头,有以塞尔维亚学者及其他前南各国学者参加的历史对话,从2001年开始,围绕前南内战的历史根源等11个课题进行了共同研究,达成了一定共识,并于2005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大量屠杀亚美尼亚族人开始了历史对话。2009年,首次参加了由波兰主办的二战开战70周年纪念仪式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宣布由两国历史学者将对二战期间在卡廷被集体屠杀的上万名波兰军官进行共同研究。

欧洲的种种国际历史对话在东亚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和教师,通过三年的历史对话,于2005年在三国同时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成为本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除此之外,在日韩两国间由民间发起的历史对话更是多种多样。历史最悠久的是日本学艺大学和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之间开展的历史对话,经过10年共15次的学术讨论会,终于在2007年出版了双方学者共同编撰的《日韩交流的历史》。除此之外,两国学者教师们还共同编著出版了多达

^① 例如在美国史学界最具权威的《美国历史评论》于2009年组织了有关国际历史对话的论文研讨,见 AHR Forum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2009), 899-977.

5、6种共同历史读本。在东亚,政府间的共同历史研究是由日本政府提出的,于2002年在日韩两国间正式启动。双方各自组成由专业历史学者的研究团队,围绕自古以来的两国关系历史分为3组进行了研究与对话,并于2005年3月发表了第一次研究报告。2007年,两国又开始了共同研究的第二期,并增设了历史教科书小委员会,于2010年3月发表了研究报告。

以上可以看出国际历史对话,已经逐渐成为国际间解决或缓解历史纠纷的一种模式。这些历史对话,或由政府出面组织,更多是民间学者发起;有的是限于两国,有的是有多方学者参加。对话的成果,也有两论平行的双方报告,也有共识与分歧并记的共同报告,也有共同执笔的历史副教材。这些对话,或增进了相互了解,或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些对话的过程,其重要性不亚于成果。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对话的“内”——参加者如何进行理性的学术讨论——和“外”——如何将共同研究的成果向外界广泛传播——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关于历史的共识如果仅停留在少数学者之间,对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由于历史问题所产生的国际纠纷无疑是隔靴搔痒。

二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南京大屠杀

于2006年底正式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有以下形式特征:日方参加者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原因是他们既不是常来中国访问或参加学术活动,基本立场与国内学者较为接近的“进步学者”,也不是因经常受到点名批判而知名的“右翼人士”。这些学者虽然他们各人背景和立场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以被称为“主流派”。他们大多正值中年,在当今日本学术界有较强影响。与这些学者的对话,既不同与“进步学者”交流有共同立场的心理基础,也不能将意见不同而简单地归结于对方的“右翼”立场。

虽然中国参加者过去在不同场合与日本学者有过各种交流对话,但作为一个国家间共同历史研究的一方“代表队”的成员,对双方参加者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影响。考虑到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双方报告都是由个人(包括研究协力者)起草,先是在各自国内充分讨论,然后在双方的共同会议上再提交讨论。可以认为最终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各方集体的意见。

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双方都相当重视的一个主题,被列为双方共同商定的小标题之中。仅从页数上来看在有关1937-1941年中日战争(中方称抗日战争)的记述中占到1/10前后。

南京暴行的内涵,范围与规模,自东京审判以来就是最有争议的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方报告较详细地叙述了日军集体杀害中国战俘和平民,并以专门段落描写日军在南京“大肆强奸中国妇女”,以及纵火和掠夺,而且指出暴行的范围不仅局限在南京市内。并将以上行为归纳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中方报告中在对种种暴行中提出了许多基于原始资料的具体的数字,但对于争议最大的屠杀受害者(以及强奸案)总数却是相当简洁,仅仅引用了二战后两个军事法庭判决书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方虽提到“发生了日本军对俘虏,残败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的集体的或个别的虐杀,而且经常发生了强奸,掠夺和放火”,但算是一笔带过,而对被害人数却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军事法庭的3种数字(比中方多1种)和日本研究者之间从2万到20万上限的种种不同估计,并提到受害人数不一致的各种原因。对于日方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除俘虏和平民之外的“败残兵”和“便衣兵”,中方报告则未提及,也没有做出反论。

对于在南京发生大规模暴行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叙述也有一定差距。从这次共同研究的报告来看,只应验了一半中方报告对于加害方日军暴行的原因,是较为间接地简单提及。比如关于杀害中国战俘,报告一方面用现有日本史料说明日军“自上而下执行屠杀俘虏的政策”,同时也指出“由于

日军后勤准备不足,且因俘虏众多而担心带来不安全,一些部队于是“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这一解释修正了以往常用“日本军国主义”或“日本武士道”这些抽象概念来解释南京暴行的倾向,并放弃了认为屠杀战俘的命令来自日方军部的预谋这一观点。这说明中方学者借鉴并吸收了日本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重视了局部甚至带有偶然性的因素。不过,作为对日军集体屠杀中国战俘这一南京暴行的核心问题的解释,不能不让人感到略为单薄。^①与中方报告相比,日方报告对暴行的原因专门列一段落加以叙述,提到日方从开战时就缺乏有关战俘及平民的对策,在南京更是有宪兵不足,以及由于补给跟不上而引发军纪松散等原因。其中与中方的解释有相近之处,与中方报告最为不同的是日方报告中的“牺牲扩大的副因”即中方防守的各种失误等等。与此相比,中方报告写到“在日本海军封锁长江南京江面后,中国守军大都未能突围而被俘”;或是较为婉转地指出“由于无路可退,部分中国守军官兵脱下军装,扔掉武器,避入南京难民区”。

仅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专题来看,这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双方报告可以说既有交叉的部分,也有是平行线式的。作为首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为了将来的继续深入研究与对话,奠定了基础。

三 中日间历史对话的展望

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结束即将一周年之际,对今后的中日历史对话可以做以下三点展望。

国际历史对话应该是多层次的。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或许能较快将研究成果反映到官方政策中,但也有种种局限,比如这次对于共同研究报告发表的屡屡推迟。因此,可以考虑半官半民,或民主官辅等形式。此外,应在两国历史学界建立更为广泛的交流对话的渠道,除政治外交史外,经济,社会,女性,文化。此外,在历史教育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也应该提到日程上。

历史对话的学术性仍有待更加提高。政府和民众应当让历史学者能在较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开展研究,而避免将学术研究和政治立场过多地画等号。此外,为了减少外界对学术讨论的干扰,将双方讨论列入非公开是有必要的。象日韩共同历史研究那样将对各篇论文的评论以适当的方式发表,也可以增加学术含量。最后,既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是历史共同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第三者的研究成果,最近东亚的共同历史研究还做的不够。^②可以想像,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发展,第三方的研究成果常常对于两国争执不下历史纠纷会产生一定影响。

历史对话应该是长期的。东亚的历史对话为时尚短。与西方各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历史对话相比,有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共同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历史对话应该是有持续性的,日常性的。正如中日共同研究报告指出,中日两国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形成的历史认识的差异,通过为期三年的共同历史研究是不能全面消除的。相信,经过持之以恒的国际对话,最终历史学者不再是一国中心的历史的代言人,而成为超越国境的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并且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共同研究成果有一定的认同。这在曾经为数百年的国家间战争所折磨的欧洲已成为现实,这在东亚有一天会实现。

(作者杨大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笔者曾经指出,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原因解释,会更难以达到意见一致。同时,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最好通过多层次去全面的说明原因。详见《南京事件再考—原因論をめぐって》,『アジア太平洋戦争(8):戦場の諸相』,東京:岩波書店2006版。

② 自2000年开始,由哈佛大学发起的中日美三国对中日战争的“共同研究”已出版了多种成果。部分内容可见 <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sino-japanes/>。